

收稿日期:2025-12-10

创伤·记忆·叙事

——《流俗地》的梦境书写研究

程璐, 向忆秋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黎紫书小说《流俗地》中的梦境意象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叙事功能,可从精神分析理论、创伤理论和集体记忆理论的视角加以分析和解读。在虚实交织的叙事中,通过对细辉、银霞、婵娟等人的梦境书写,揭示了隐秘的个体创伤,同时又以组屋、锡矿等南洋符号为载体,与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形成深度互文,映照出族群生存的结构困境。此外,《流俗地》通过梦境打破线性时间,以环形叙事串联个体经验与时代记忆,最终在“记忆—梦境—现实”的框架下,完成对马来西亚底层社会生存图景的寓言化书写。

关键词:黎紫书;《流俗地》;梦意象;梦境;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2-011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南亚华文文学史料专题研究、分类编纂及数据库建设”(22&ZD272)。

作者简介:程璐(2000—),女,安徽黄山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向忆秋(1974—),女,湖南溆浦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华人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2.012

梦境作为文学书写的核心意象之一,承载着解码文本深层意蕴的重要功能。从古典文学中预示命运的占梦传统,到现代小说中潜意识的诗意呈现,梦境始终是创作者探索人性的重要媒介。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领域,黎紫书的《流俗地》凭借其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文化意象和对底层社会的深刻刻画,引起了学术界重视,刘俊等多位学者纷纷著文研究。《流俗地》以盲女银霞的独特视角,描绘了马来西亚锡都的市井风俗与华人群体的浮世百态,展现了普通民众在命运洪流中的坚韧与温情,而其独特的梦境书写更是为作品增添了别样的艺术魅力。当前对《流俗地》的研究多聚焦于叙事结构、地方书写的空间张力和女性群像的生存困境等,而对梦境意象的深入分析仍显不足。本研究将立足于梦境意象的书写,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创伤理论与集体记忆理论,深入剖析《流俗地》中梦境的文化内涵与叙事功能,探讨其在文本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意义指向,以为《流俗地》的研究提供多元的视角。

一、个体创伤的隐秘表达

在黎紫书的《流俗地》中,梦境是个体创伤记忆的重要隐喻与表达方式。这些创伤源于个体在成长、生活和社交中经历的重大精神打击。细辉因好友离世和家庭变故而感到迷茫,银霞因身体残疾和被暴力伤害而倍感孤独与痛苦,婵娟因陷于教育伦理困境而深感无力,这些创伤通过梦境得以呈现和回应,展现了人物潜意识中的痛苦和挣扎。通过对细辉、银霞和婵娟的梦境描写,小说展现了创伤的复杂性与重复性,揭示了个体在面对创伤时的无力感。

(一) 细辉的“镜中之梦”

在小说中,细辉的梦始终围绕着“巴布理发室”这一空间展开。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梦是潜意识欲望的表达,而细辉梦中“昏暝而闷热”的理发室,既是马来西亚潮湿闷热气候的具象化,也是其精神困境的隐喻。他反复梦见自己试图钻入镜中与好友拉祖对弈,却总以失败告终。这种重复的挫败暗含双重创伤:拉祖的早逝如同悬在记忆中的利刃,而银霞、拉祖、细辉“三人组”在童年共度的温暖时光,也随着他们的成长消散为不可追回的幻影。拉康提出的“实在界”概念,恰好诠释了这种创伤的本质。“实在界”相对于我们人类主体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缺场物,一种彼岸,不过,就其本身而言,它无疑又是在场的,拉康称之为一种作为“缺场的在场”^[1],它既在又不在^[2]。在细辉的梦境里,棋盘上的棋子永远凝固不动,恰似拉祖的死亡已成定局。那些试图在梦中重拾往昔的徒劳举动,正揭示了“实在界”的残酷真相——有些现实超越语言与符号的秩序,成为无法言说的永恒缺憾。细辉的梦境如同一面雾蒙蒙的镜子,既映照出他对逝去友情的追念,也暴露出面对生命无常时的无力。每一次失败的镜中对弈,都是创伤记忆的无声回响,将细辉困在回忆与现实的夹缝之中。

而在哥哥大辉失踪后,细辉的梦境从“镜中困局”滑向“溺水窒息”。家庭的重担、妻子的抱怨,以及店铺的繁忙,使得细辉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不安,那段时间细辉常常做噩梦,“在梦中屡屡掉入水里或被卷进流沙之中,最终在梦里窒息,于现实中醒来”^[3]¹⁴⁵。这种噩梦不仅是对现实压力的隐喻,也是对童年创伤的再次唤起。凯茜·卡鲁斯指出,创伤具有延迟性^[4]。细辉的噩梦正是这种延迟体验的体现,他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困境,只能通过梦境得以反复呈现。

(二) 银霞的“黑暗之梦”

黎紫书在《流俗地》中通过银霞的梦境系统,构建了多重维度的创伤记忆书写。作为先天视障者,银霞的创伤根源,不仅在于视觉被剥夺导致的认知局限,更在于感官代偿机制下被强化的记忆刻痕。在银霞的梦中,始终以嗅觉与听觉为主导感知模式,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使她的创伤记忆呈现出区别于其他角色的表征形态。

当细辉以视觉叙事复现巴布理发室的物理空间时,银霞的梦境却编织出由十余种气味符号构成的嗅觉图谱,“除了人声,她的梦里还充满了巴布理发室的气味。迪普蒂早晚在店里焚烧檀香,敬神辟邪,顺便驱蚊,还有偶尔参与的茉莉花、酥油灯和她那一头终年抹了椰子油的长发及簪在发上的鸡蛋花,加上其他银霞叫不出名堂来的香料以及剃须膏清爽的薄荷味。午间高温,各种树脂的香木的鲜花的化学的芳香混作一炉”^[3]²⁷。和细辉一样,巴布理发室是她反复回到的场景,这个混杂着童年温暖与成长困惑的复合空间,通过嗅觉记忆的持续发酵,逐渐固化为银霞潜意识中的创伤性场域。作者通过设置银霞与细辉的梦境对照,揭示了感官机制对创伤记忆的建构作用。相较于细辉对空间场景的完整复现,银霞的嗅觉主导型梦境存在悖论:一方面,银霞超常的感官敏锐性突破了现实认知的局限;另一方面,这种过度敏感又加深了她的创伤体验。

这一特点在华人接生楼的嗅觉触发事件中尤为显著,“猪油,生抽和峇拉煎辣椒的香气”让人沉醉,银霞“闻了一阵便觉得脸红心跳,回到家里已有点头昏脑涨,步履不稳”^{[3]95}。这种气味带来的短暂愉悦,最终导致了银霞的梦游行为。当现实中的美好气味与银霞因视觉缺陷而变得格外敏感的感官相遇时,银霞的内心世界开始失去平衡,先天的缺陷使她无法完全融入现实,而香气的诱惑又不断冲击着她的防线,两者的矛盾打破了她试图维持的心理平衡。

在银霞的一生中,眼盲的缺陷使她承受着种种苦难,她从小被“困”于家中无法远行,更无法接受应有的教育,与朋友也在成长路上逐渐走散,在盲人学校被人侵犯并怀孕,现实的困难与梦境中循环出现的暴力场景形成了呼应。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的欲望以伪装的形式进入意识。银霞的梦境正是这种潜意识表达的体现,她反复梦见“那些被封印在楼上楼里的女鬼,有眼无珠的,怀抱幼子的”,或梦见“自己成了躺在停尸房中的一具尸体,四周寒冷得令人结霜,她清清楚楚感受到肉身被剖开,有人取出她的子宫,梦中的操刀者说的都是英语,说怎么找不到婴儿呢”^{[3]395},这些象征着她对自身创伤的恐惧与无力感。这种梦境中的“解剖”场景,不仅是对打胎经历的再现,更是对创伤的重复体验。卡鲁斯指出:“创伤的历史力量不只是表现为经验在其遗忘之后的重复,而且表现为只是在内在的遗忘中并通过内在的遗忘,它才被首次经验到。”^[3]“内在的遗忘”,只是“内在潜伏期”而不是真正的遗忘。银霞的梦境正是这种“内在的遗忘”的延迟体验的体现,她在梦中不断重现创伤场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处理内心的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银霞的梦境中还频繁出现“猫”,承载着银霞对于流产胎儿的复杂情感投射。银霞“梦见了猫,并一次又一次在暗中呼唤与追赶它,最后抱着它受了伤的湿漉漉的身体,号啕大哭”^{[3]394-395}。这里的猫象征着银霞意外怀孕的孩子,它在梦中呈现出“无能的小生命”的形象,没有了活力,与现实中银霞被迫流产的经历形成呼应,当危险来临时,他们都是任人宰割的弱者,不同的是那个孩子完全没有思想意识,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流掉^[5]。

(三) 婵娟的“迷宫之梦”

在《流俗地》创伤叙事谱系中,婵娟的梦境更多地反映了创伤内化的典型症候。与银霞的感官代偿、细辉的空间之梦不同,这位中学教师的心理创伤源于目睹学生自杀事件而引发的伦理困境。女学生的幽灵频繁出现在婵娟梦中,成为她无法摆脱的阴影。而现实中,婵娟被迫在多重压力下维持“正常”,每日经过学生坠楼地点,承受网络流言的侵扰,应对学校与家庭的责任。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使她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在梦境中显影为一场无休止的自我审判。

在梦中,教学楼变成了一座不断变化的迷宫,“楼梯不再是楼梯,课室不再是课室,宛然一座持续变幻中的迷宫,随着她的行走而扭曲变形,让她走不出去”^{[3]285}。婵娟在其中仓皇奔走却跑不出去。“迷宫”在这里既指向了创伤的不可逃避性,自杀女学生幽灵的反复出现,迫使婵娟直面自己未履行的教育责任,当她试图逃离迷宫时,总会被学生追问课业、校长问责和同事求助等小事打断。这些日常琐事的超现实集结,实质上是教育体制暴力的人格化投射。她无法摆脱这些琐事的纠缠,就像她无法摆脱内心的创伤一样。这种无力感在梦中被进一步放大。当她试图逃离迷宫时,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不断变化的空间中。这种被困的状态不仅是对创伤的重复体验,也是对现实困境的隐喻。

梦境与现实的交织,暴露出婵娟行为中潜藏的“平庸之恶”。汉娜·阿伦特将“平庸之恶”定义为个体因放弃思考、机械服从制度而导致的道德盲视。作为教师,婵娟的“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她对犯错学生实施羞辱性惩罚,让犯错的学生“在椅子上站一节课,有些更顽劣更可恶的则站在桌子上”,甚至会“将他们的罪名写在一张全开马尼拉卡上,‘我没交作业’‘我懒惰’‘我愚蠢’‘我没礼貌’……要他们把它举到胸前,站在课室门外示众”^{[3]280};另一方面,她对校园霸

凌的默许与麻木,成为暴力滋长的帮凶。最具讽刺性的是,自杀女生生前遭受的霸凌手段,正是对婊娟体罚方式的模仿——霸凌者逼迫她举着“我是ET,我有病”的牌子示众。这种行为暗示着教育暴力的传染性:当教师将学生物化为管理对象时,暴力便从制度渗透至人。

黎紫书通过婊娟的梦境,进一步解构了“平庸之恶”的运作机制。在梦中,婊娟的尖叫与哭泣宣泄了情感,但醒来后的“失语”状态却暴露了更深层的困境:创伤记忆被阻隔在语言系统之外,无法通过符号化完成疗愈。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理论在此显现出两面性:梦境释放了压抑的情感,却也因语言失效而导致创伤固化。这种“可发声却不可言说”的症候,恰是婊娟精神困境的缩影:她既是教育暴力的执行者,又是体制异化的受害者;她既渴望逃离体制的束缚,又无力挣脱身份与生计的枷锁。最终,婊娟辞去教师之职,这一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从个体层面看,这是对创伤的消极逃避;从叙事隐喻层面看,它揭示了“平庸之恶”的破解可能,当个体拒绝继续充当制度齿轮时,暴力的循环链条便出现裂痕。婊娟皈依佛教,每日诵念《大悲咒》以求得灵魂的开解。但这一行为并非彻底解脱,而是一种妥协式的自我疗愈。通过宗教仪式,婊娟将无法言说的愧疚感转化为可被接纳的心灵寄托,从而在精神层面逐渐完成对创伤的治愈。

二、梦与集体记忆的互文性

在《流俗地》中,梦境不仅是个人创伤的体现,更是对民族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深刻表达。黎紫书通过梦境,将个体经历与马来西亚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揭示了潜藏在社会群体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在直接的殖民统治结束后,原宗主国与原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关系依然存在,这种关系深刻影响着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等问题^[6]。黎紫书的创作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她通过梦境中的南洋意象,间接地重构了马来西亚华人的集体记忆。这一记忆聚焦于马来西亚华人的移民奋斗史、文化遗产与身份认同焦虑,既包含着“五一三”事件后的政治压抑,又承载了坚守母语文化的顽强精神。

(一) 南洋意象

保罗·康纳顿认为,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是社会记忆传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7]。在《流俗地》中,梦境是一种特殊的“身体实践”,在梦中通过南洋意象将个体记忆与集体历史相连。例如,梦境中频繁出现的“组屋”意象,不仅是人物生活的背景,更是南洋社会变迁的隐喻。组屋作为马来西亚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居住形式,承载着移民社会的集体记忆。在小说中,随着经济生活的好转,当年生活在组屋的人们逐渐分散,拉祖和细辉都搬了出去,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银霞和父母搬去了美丽园,组屋成为一种对过去缅怀与反思的载体。

此外,梦境中的“锡都”意象也具有重要的集体记忆意义。锡都显然就是黎紫书的家乡怡保。这座马来西亚北部山城以锡矿驰名,19世纪中期以来曾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来此采矿垦殖,因此形成了丰饶的华人文化^[8]。锡都不仅是小说中人物安身立命的所在,更是黎紫书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深刻致意。小说中频繁出现的锡都意象,既是对南洋经济历史的隐喻,也是对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的再现。通过梦境的叙述,这种意象与历史记忆中的锡都形成了互文关系,重构了马来西亚华人的集体记忆。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锡都这座城市,随着主人公银霞的三次移居,“文冬新村”“楼上楼”组屋和“美丽园”这三个多民族聚集地的移民生活现实得以展现。通过梦境,锡都被赋予了超越现实的意义,完成了个体对集体历史的反思与重构。

(二) 民族记忆的烙印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9]。在《流俗地》中,梦境中的南洋意象正是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体现。在梦境中,个体对南洋历史的记忆被重新编织,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集体想象。小说的时间背景始于“五一三”事件之后,这一事件反映了华人社会所面对的苦闷与压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长大,他们的命运与马来西亚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黎紫书通过《流俗地》完成了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深刻致意,银霞等人的受困状态隐秘折射出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境遇和生存处境:对国家一往情深却备受质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处处受限。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多元文化都有一定发展,但各种族之间多年来冲突不断。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华人地位一降再降,华人在社会场域中遭受重重限制。小说对盲女银霞生命历程的描述,可视为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历史遭遇的寓言化表达^[10]。黎紫书的创作,不仅展现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记忆纽带,也揭示了在后殖民语境下,民族记忆如何通过文学作品得以保存与传递。这种记忆的重构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更是对未来的展望,体现了华人族群记忆书写既充满寓言性又有现实观照的特质。在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银霞似梦非梦的体验,隐晦地提及了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这次大选迎来了联邦政府六十一年来的首次政党轮替,象征着华人长期被压抑的命运出现一丝转机。这种结尾不仅为小说增添了希望的色彩,也体现了民族记忆在历史变迁中的延续与重构。

此外,梦境中的马来食物、粤语歌谣等元素,也带着华人移民留下的民族烙印。例如,银霞梦游时哼唱的粤语儿歌“幽幽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3]97}。它不仅反映了华人移民的文化遗产,也体现了在梦境中潜意识对民族记忆的表达。这些元素通过梦境再现,成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记忆纽带,构建了一个关于马来西亚华人身份的想象的共同体。梦中出现的“锡塔琴”“臭豆莢”“笋壳龟”“白须公”等,这些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东西,也说明了在不知不觉间马来西亚华人也受到了当地文化风俗的影响。

三、梦意象的叙事功能

在《流俗地》中,梦境不仅是个人创伤和集体记忆的载体,而且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黎紫书巧妙地运用梦的意象,推动情节发展,增添悬念和神秘感,同时模糊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一) 情节推动

黎紫书以梦境为核心,通过倒叙和插叙的交织,串联起“五一三”事件之后普通民众的生存图景。在小说中,梦境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工具,为故事增添了悬念和神秘感。

一方面,梦境在小说中起到了情节预言的作用,奠定了叙事的悬念基调。故事开头,银霞“认出大辉声音”,引出了回忆中的人物。而细辉在巴布理发室中的梦境则引出了三人组中的另一位人物——拉祖。梦境的断裂感为读者埋下双重悬念:拉祖的身份之谜与命运之厄。随后,银霞的梦也进入读者视野。在银霞的梦中传来拉祖的遥远话语“逐字逐字,像从远处接踵而至。他说:‘银霞你唱歌吧,你的声音好听得像锡塔琴。’”^{[3]31}这与后文梁虾的丧礼上拉祖说的“你唱歌好听呢”的回忆形成残酷呼应,梦境成了死亡预言的诗意化表达。

另一方面,梦境也承担了真相揭幕者的角色。银霞的梦游事件意外揭开了组屋闹鬼的秘密,所谓的“鬼”,实则为绝望轻生者的集体幽灵,其代代相传的悲剧与银霞后续遭遇的女鬼幻象形成镜像。那些反复梦见“楼上楼”的女鬼哭诉,在道士驱鬼仪式中捕捉到的幽冥之声,都生动展现了马华底层社会多元杂处、巫风盛行的现实^[10]。后文中银霞与母亲梁金妹反复梦见的“抱婴女鬼”,则与银霞在盲人学校遭强暴、中断学业的经历形成互文,使被压抑的创伤记忆通过梦

境变形得以浮现。

此外,梦境也驱动人物蜕变,这在婵娟的故事线上尤为显著。小说以梦境作为婵娟的叙事切口,直接引入其困境:梦境中坠楼学生的幽灵反复出现,迫使她不断反思因教育暴力间接导致学生自杀的“罪孽”。随着梦境重复,长期积累的创伤压力逐渐瓦解婵娟的心理防线,最终导致其辞职。黎紫书通过梦境的量变叠加完成人物行为的质变书写:每一次梦的重复都在瓦解婵娟的心理防御,直至她无法承受而选择辞职。这种叙事策略,既书写了个体在结构性暴力中的挣扎轨迹,也凸显了梦境对人物命运的推力。

这些梦境如同细密的针脚,既勾连起银霞、细辉、婵娟等人的命运轨迹,又悄然揭开锡都市井中多元族群共生的真实图景。通过梦境,黎紫书巧妙地将人物的命运与情节的发展紧密相连,使故事更具吸引力。

(二) 虚实交织的叙事风格

黎紫书通过模糊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流俗地》中,梦境不仅是情节发展的工具,而且起到了重要的结构作用。通过梦境与现实的模糊边界,作者构建起“锡都”与“梦都”的双重空间,强化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黎紫书对梦境的描写极具诗意,用梦意象生成了一个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她对梦的语言有出色的掌握,尤其是对婵娟梦境的多次叙述简直有惊心动魄的效果。每一次婵娟从梦中慌乱逃脱,都如“壁虎断尾”或“壮士断臂”一般,“目光虚浮,魂魄像脱臼的四肢悬挂在躯干上”。通过梦境书写,黎紫书展现了人物内心的恐惧和挣扎^[11]。除此之外,细辉的梦被描述为“梦也被灌饱了墨汁,如鱼睡在水中,没听到梦境外头的声响”^{[3]263},而蕙兰疲倦时则“像梦里蛰伏着一只巨大的章鱼,只要她一阖眼便硬生生将她吸进充满墨汁的肚腹”^{[3]211}。这些描写,不仅展现了人物的状态,还为小说增添了一层神秘梦幻的面纱,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虚实交织的世界。

小说的梦境叙事还是非线性叙事的时空锚点,是倒叙与插叙的枢纽。小说以银霞“认出大辉声音”的事件为起点,通过梦境串联“五一三事件”后的离散记忆。巴布理发室的梦境,既是童年乌托邦的入口,也是成年创伤的回溯通道。在这个充满印度风情的空间里,银霞、细辉和拉祖度过了他们的童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童年乌托邦逐渐成为成年后的回忆与创伤的象征。梦境中的巴布理发室不仅承载着人物的童年记忆,也反映了他们成年后的心理变化。梦境同时也是记忆碎片的黏合剂,小说的重要事件,如拉祖的死亡、银霞的堕胎、婵娟的辞职等,均通过梦境预兆或回溯,从而打破线性时间桎梏,形成“记忆—梦境—现实”环形叙事。

四、 结语

《流俗地》中的梦境书写,以三重维度构建起个体与族群的生存寓言,将个体创伤、集体记忆与叙事逻辑相互交融:创伤构成叙事的核心,记忆为叙事提供素材,而叙事则将创伤与记忆以寓言化的形式呈现,三者环环相扣,共同编织出一部关于马来西亚华人身份与命运的生存寓言。梦境是个人创伤的隐秘载体。细辉在巴布理发室的镜中困局、银霞因先天视障而在感官代偿机制下生成的黑暗之梦、婵娟的伦理困境之梦,均以超现实意象折射现实暴力对弱者身心的摧残。梦境成为重构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组屋、锡矿、粤语童谣等南洋意象,在虚实交织中凝结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基因。这些符号既是历史伤痕的见证,也是身份焦虑的隐喻。梦境革新了传统叙事方式。通过打破线性时间、勾连记忆碎片,黎紫书以环形结构串联“五一三”事件的政治阴云、锡都的市井烟火与新世纪的历史转机,使个体经验升华为族群命运的集体叙事。

《流俗地》通过梦境完成了一次文学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它既为生活在都市中的普通人立

传,也为马来西亚华人的集体记忆提供了诗意的存储形式。在梦境与现实的交界处,黎紫书以痛感书写生机,以虚妄折射真实,为马华文学开辟出一条兼具美学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叙事路径。

参考文献

- [1] LACAN J. Le Séminaire Livre II: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M]. MILLER J A, ed. 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78:262.
- [2] 黄作. 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4.
- [3] 黎紫书. 流俗地[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 [4]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17.
- [5] 和之缘子. 黎紫书小说中相互缠绕的女性与猫:以《流俗地》为例[J]. 长江小说鉴赏,2024(5):48-51.
- [6]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
- [7] 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0.
- [8] 王德威. 盲女古银霞的奇遇:《流俗地》代序[M]//黎紫书. 流俗地.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2.
- [9]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8.
- [10] 蔡颂,刘迪男. 在地寓言与现实衍射:《流俗地》的族群记忆书写[J]. 长沙大学学报,2024(4):89-95.
- [11] 李俏梅. 叙事的诗意及对存在的诗性领悟:论黎紫书长篇小说《流俗地》的诗性叙事结构[J]. 中外文论,2021(2):225-235.

Trauma, Memory, Narrative : A Study of Dream Writing in *Land of Prevalent Custom*

CHENG Lu, XIANG Yiqi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dreaming imagery in Li Zishu's novel *Land of Prevalent Custom* possesses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narrative function, which can be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trauma the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In the narrative of interweaving reality and fiction, the author reveals the hidden individual trauma through the dream writing of Xihui, Yinxia, and Chanjuan. Meanwhile, she uses the Nanyang symbols, such as shophouses and tin mines, to form inter-textuality, together with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colonial history. It mirrors the structural surviving dilemma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addition, this novel breaks the linear narrative mode through the dream writing, connecting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era through circular narrative. She completes the allegorical writing of the survival of the Malaysian underclas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emory, dream, reality".

Key words: Li Zishu; *Land of Prevalent Custom*; the dreaming imagery; dream; collective memory

〔责任编辑:王建霞〕